

# 大地水根

□吴昌勇



在我的老家,孩子的成年礼是从肩头放一副挑泉水的扁担开始的。这是乡间野大苦大的孩子,在挑起生活的重担之前,于柴米油盐的琐碎中,肩头压上的第一副担子。没有仪式,也无须旁人见证,礼成在不经意间。

扁担初上没有磨出老茧的肩头,总是晃晃荡荡,水桶在半空中左右摇摆,如醉汉般腿脚不听使唤。一担水,到家时只剩下两个少半桶,其余的泼洒在路上。

见此阵势,大老远就有人靠路边站,腾出一条道来,一脸爱怜地盯着扁担两端颤颤悠悠的水桶。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,将山泉水视为粮食一般金贵,洒落在路上,又不能一粒粒捡拾起来,眼巴巴地看着糟蹋了,未免有些心疼和惋惜,忍不住提醒:稳住,稳住,腰伸直,脚步放慢,手搭在扁担上,甬东张西望。

山里不缺水,每逢盛夏,草木茂盛处,牛羊出没处,蝉鸣鸟叫热烈处,定然有一汪清流盈盈闪闪闪着银光。更何况,大沟里的水终日哗哗流淌。但是,泉眼里冒出来的水,是最清冽醇厚的窖藏,被簸箕般的树叶一滴一滴筛选过,被植物根系编织的大网过滤过,被层层叠叠的青石一遍遍打磨过,是从大地粮仓里搬运出来的精品。能有一眼山泉,是一个村子的灵气,也是村里人的福气。但凡老辈人,总习惯将水泉称作老水井。有了年份,就有了故事,如慈祥的老人,膝下是乌泱泱的儿孙,是和儿孙们一样乌泱泱的水波。

村子里的老水井在山脚下,是就着山势凿出来的一个正方体,深浅宽窄亦一米余,井上覆着一块青石板,井外有两道台阶,左右两侧各有一个能放下水桶的小石坪,铺着尺把厚的石垫。晶莹的水珠从拇指大小的泉眼涌出,串珠般顺着井壁洒落,在水面上溅起细碎的水花,也传来叮咚作响的水声和鸣。井里的水盈满后,沿着井外的一条小道流出去,不远处是两方水田,一块种稻,一块栽藕。再远处,就是两山之间的一条大沟。一口井,养活了村里十余户五六十口人,还养活了两块水田,雨水充沛时,溢出井口的泉水顺着堰渠扑入溪流的怀抱。自我记事起,老水井从未缺过水,即便是烈日炎炎的夏季,或者大雪封山的隆冬。据村里的老人说,这口井也说有上百年的历史,在他们的记忆里,井里的水一直满满当当。

到井里取水,多在东方露白的早晨。乡亲们起早上工前,总是习惯了先担两桶水,让厨房里

的水缸和老水井保持相同的水平面。通向老水井的路上,在一大早就热闹起来,路上洒下点点滴滴的泉水,也洒下庄稼人的欢声笑语。或许这是一种最朴实的朝拜和清安,在开始一天的辛勤劳作之前,大家先行和老水井打声招呼。

老水井有老百姓的日子,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日子,每天打个照面,彼此间才能心安。老辈有话,人有情,水才有根。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,把饮水思源演绎到了极致。村里有个规矩,牛羊牲口一律不能在老水井饮水。起初不懂,后来从老辈那儿得到了答案:不是怕牲口污了水,是怕牲口的粪便弄脏了井身。就像一位干净整齐的老者,乡亲们要让泉眼里冒出来的每一滴水都没有多余的褶皱,就算日子再苦,都不能让每一滴水打上补丁,就算农活再重再忙,也不能让每一滴水有汗腥味。老水井的水就是这样讲究,这样排场,这样冰清玉洁。

我曾见到一个年岁不大的小子,提着水桶从井里提水让牛羊解渴,见此情形,村头的老人用拐杖笃笃地敲着石板,皱着眉头,一个劲儿地责怪道:没了王法,简直没了王法。日暮时分,孩子的家人拿着水桶和水瓢,将水井反复淘洗一番后,又给众人赔礼道歉。那种愧疚感,让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感觉到老水井在村里人心中的位置和分量。

每年夏季最热的那几天,大暑或者小暑节气,村里人会晌午时分相约前往老水井,他们衣衫整齐,神情庄重,提着桶拿着瓢握着铁铲或草锄,要为老水井完成一次清洗。小心翼翼地除去杂草,铲掉污泥,就像农历春节前家家户户的大扫除。之所以会选择在盛夏,原因只有一个,日头底下的大清洗不会让老水井受凉感冒。这种说法很有诗意,但更多的是一份饱满的真情。这对着老水井和老水井哺育的山里人而言,都有着节日般的盛大和喜庆。仿佛老井就是一个村庄的露天大水缸,不高兴,一星半点儿的浑浊,他们要让这一脉清流沿着最干净的水路,流进最干净的水井,要让草木看见,让青山看见,让头顶的蓝天白云看见,也要让后辈们看见。

人心似泉,泉如人心。老水井之所以绵延百余年,仍清流如常,除了大自然爱的浸入,除了日月四季雨露风雪的陪伴,除了白云帐幔下巍巍青山的藏纳代围,围在老水井身旁的这方乡亲,才是这方水土上奔腾不息的人间烟火,是他们让悠悠水波露出花容。在地面以下,老水井亦是投向大地深处的袅袅炊烟,亦如虬曲盘错的水根,和草木的根系同出一脉,遍布青山的肌理,如碧波荡漾的生命之河向着远方延伸。

若干年后,当我真正担起生活的重担之后才明白,老水井就是一部大地哲学的生动教材,它的肩头亦有一副关于滋养万物的担子。在予和受、出和入、盈和亏、浮和沉之间,老水井仅用一捧清泉就诠释了这其中的深意。也许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老水井,都有自己的根脉和传承,而散布在广袤田野的一只只泉眼,不正是厚土和高天对望的一双双慧眼吗?抑或漫天繁星在苍茫大地的倒映,在黄土地铺展的云彩里,闪烁着,皎洁着,也慷慨着,指引着,照耀着。

2018年6月9日下午,我来到北川老县城近旁山腰一处芬芳四溢的农家乐,不用踮起脚尖蹦跳,随意展开双臂,就能摘到鹅黄姜黄苍黄润泽光鲜的枇杷,或三两枚摇曳,或五六枚一撮,欢天喜地地点缀在枝头。蜜蜂在浓郁的枝叶间嗡嗡闹闹,一只蝴蝶从风华正茂的榆树枝上滑翔而去,稳稳地站立在一朵酒红色大丽花上,蓝色花纹的翅膀扇动了几下,并没有惊艳丰满的花瓣,花朵连稍微颤动一下都没有。

正在我低眉细看的时候,一位平头消瘦的中等个子男士快走两步,颌首向我伸出右手,我伸手的同时说道:汪工辛苦哦,周末还加班吗?

汪工说:连续两三个月大家都没有休息,保电任务终于完成,今天是周末,一起出来放松放松。

我随口问:保电?是夏季用电高峰期保电吗?

汪工看了我一眼,又看我一眼。大丽花上的蝴蝶早不见了踪影,娇妍的格桑花在若有若无的山风中轻松随意,青春正好。

时间似乎有点长,空气停滞了一般。或许他没有听见呢。再看他时,感觉他耳聪目明,莫不是触碰到汪工的辛酸事了,来之前怎么没有打听一下他的基本情况呢。不觉想起前几天在都江堰采访时,不止三个人告诫我,北川是个伤心地,不要见人就问,一位妻子给丈夫打电话说,你娃儿和我娃儿和别个的娃儿,一起把我们的娃儿打了。你说北川人复杂不复杂。

汪工旁边的小伙子打破了僵局,语速很快地说:地震10周年各种纪念活动比较多,成千上万的人从各地拥来,有各级领导,也有国内外媒体,每一位外来者都会来老县城看一看,我们分管老县城供电,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出色,没有停一分钟电,都是汪工领导得好。

我哦了一声,心想,时间过得真快啊。10年前,北川县城是汶川大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,县城所在地区山镇几乎被完全摧毁,所有人搬迁出去,老县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废墟,被外界称为鬼城,既然没有人居住,怎么还要向鬼城供电呢,这不是浪费吗?

我把疑惑藏了起来,只说:刚才去你们供电所,门口好像挂着擂鼓镇供电所牌子。

小伙子说:地震后曲山镇供电所和擂鼓镇供电所合并,就叫擂鼓镇供电所了,全县三分之一的售电量在这里。

说着给我指点山下,老县城比10年前更老旧破败了。

2008年6月我第一次进入这片废墟,不但要检查证件,还要全身上下喷洒消毒液,出来的时候同样要消毒,双手必须伸进盛有消毒液的脸盆洗完手才能离开。后来有人问我,你闻到死人特有的味道了吗?我说,当时戴着两层口罩,没有闻到你说的气味,但看到了也许一生都不想回忆和倾诉的景象。我不知道是怎样熬过那段岁月的,两年间,躲着人走,星星都升起来了,还戴着帽子和墨镜,听见或看见“地震”两个字,肩膀有意无意地抖动。回到陕西就住进了医院,10年过去了,术后疤痕仍蚯蚓一样爬在脖子上。

我和汪工在小木桌前坐下,他说:领导说你要来,其实我不愿意接受采访,10年了,有的事能触碰到,有的事不想碰。

他的声音很低,言语中渗透着再怎么用力,都无法撕开的忧伤,即便是面对面,中间不过一

米宽的距离,听起来也有点费力。他四肢健全,显然没有伤残,但皮肤却与众不同,是一种被榨干水分的果皮样子,没有一点光泽和鲜活,说话的时候,额头的皱纹一跳一跳,脂肪和肌肉似乎不存在。熬干了,煎熬干了。

对的,倏忽间冒出的感觉就是这样,煎熬干了。不想碰?难道他有暗伤?

为了掩饰对他的一无所知,我无话找话地说:您怎么这么瘦呀?

他说:失眠,离“5·12”十周年越近,失眠越严重,已经失眠一个多月了,一天连两三个小时都睡不着,可能他们感应得到,我和他们在一起。地震后的两三年,也睡不着,天天失眠,再婚以后,有了儿子,睡得好多了。

我盯着他的眼睛,快速翻开记录本,开启录音笔,轻声细语地说:汪工,我记录一下,方便从头讲起吗?

他不是土生土长的北川人,老家在川内资



## 北川明灯

□杜文娟

阳市,1976年出生,成都水力发电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北川县电力公司,以前叫电力局。2003年国务院批准撤销北川县,设立北川羌族自治县,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。震后由山东省援建,一个地市负责一个乡镇,资金投入巨大,为了使灾区群众尽快过上正常生活,还建起了全国第一座110kV智能变电站,是医疗、通讯、建筑等行业恢复生产的动能保障。以前北川经常拉闸限电,线路抢修是家常便饭,现在少停电不停电的目标基本实现了。

“5·12”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,但既没有发生瘟疫,也没有灾民逃荒,这与中央和地方出台的一系列帮扶政策有关。基本实现了家家有房住,户户有就业,人人有保障。数万伤员得到救治,所有学生正常复课,孤儿、孤老、孤残人员和困难人员生活有补助,遇难人员抚恤金和丧葬补助及时落实,灾民的整体生活水平高于震前,映秀和水磨等小镇在原址上修建,漂亮得就像旅游景点。北川新县城完全是农田上起高楼,房子是新的,街道是新的,小汽车随处可见。

有一天晚上11点多,汪工接到一位妇女的电话,说家里停电了,没法给孩子冲牛奶换尿布,也没有火柴蜡烛,请求帮助。一听是孩子的事,赶快前往,发现是跳闸了,恢复用电以后,教会对方使用方法。另一次,一个地方电线老化,需要更换三根电线,傍晚时分已经更换了两根,还有一根本要第二天再架,但一想到晚上会有孩子因为没电摸黑,就一鼓作气,带着同事架完了最后一根线。

他对孩子摸黑这件事很敏感,当然事出有因。地震当天,他在位于县城的供电所上班,第

一时间跑到空地,整个县城地动山摇,山间静卧的小城顿时尘土飞扬,天昏地暗。女儿当时三岁半,因为个头超出了同龄孩子,按照年龄只能上小班,读的却是大班。单位离幼儿园很近,第一反应就是找女儿,他冲到女儿班主任跟前,迭声问到,我的女儿在哪里,我的女儿在哪里,班主任对他无力地摇了摇头。慌乱中他跌跌撞撞跑回家,出现在眼前的是尘土腾起的废墟,嗓子都喊哑了,也不见妻子和岳母应答,一家四口,只剩他一人。

救人是活人的本能,小学三层教学楼坍塌成两层,在一间电教室他发现四个小孩,椅子的一条腿插进一个男孩的腹腔,孩子没有哭,他也没有哭,但自己在颤抖。他对孩子说,你双手捂紧肚子我给你拔出来,孩子果然捂住肚子,他把椅子腿拔了出来,孩子还是没有哭。他们用绳子拴住孩子往下放,下面有人接住,然后把孩子抱到操场躺下。此后很长时间,他都不知道那个孩子活着没有,想打听又不敢打听。

县城顿时变成了无水无电的孤岛,有人劝他赶快转移,余震还会继续,保命要紧。他说自己是单位骨干,时间就是生命,电力人就是点灯人,黑灯瞎火怎么救人呢,他得做点什么。况且女儿平时怕黑,家里随时都很明亮,总在床头为她点一盏小灯,哭声阵阵的暗夜,女儿怎么能入睡呢,得为女儿和那些同样怕黑的孩子点亮一盏灯。他忍住心痛体虚,拼尽全力,拉线接电,于震后第二天夜幕降临之前,在废墟上点亮了第一盏灯。他没有等来家人,等来的是更艰巨的电力恢复工作。

2012年他再婚,妻子离异过,没有孩子,家安在离北川新县城半小时车程的绵阳,新县城离老县城也是半小时车程。妻子在绵阳第一医院工作,他每周回一次家。其实有条件迁移出去的灾民,都不愿意在老地方生活,有的害怕见到同样受创伤的熟人,有的害怕见到伤心地。按照他的条件完全可以到位于新县城的县局上班,但他不想离老县城太远,依然在这里当供电所所长。现在大儿子已经6岁,妻子怀二胎的时候,他默默祈祷,希望生个女儿,和以前的女儿一模一样,但生下来还是儿子,稍微安慰的是,大儿子长相酷似女儿。昨天回家,一岁半的小儿子趴在他肩膀上,安静地靠了大约一分钟,那一刻他幸福极了。

那场灾难过去十余年了,曾经接受我采访的幸存者,身体和心理恢复了吗?北川那位点灯人,还失眠吗?于是,我拨通电话采访了他。

他的声音依然温和,告诉我还在老县城城边上的擂鼓镇供电所工作,2020年3月不再担任供电所所长,任党支部书记。他经常为党员讲党课,焦裕禄、孔繁森是必讲内容,为党员补办《入党志愿书》。他还参与了“电靓乡村、情暖羌寨”等脱贫攻坚工作,供电所党支部先后与五星村、石椅村党支部开展结对共建活动,他还被评为北川县供电公司优秀共产党员。“还是每周回绵阳一次,大儿子上三年级,小儿子和当年的姐姐一样大,也上幼儿园。每到地震周年和清明节,我还会失眠,身高1.7米体重接近一百三十斤,比2018年咱们见面的时候,稍微重了几斤。生活还得继续,一切都慢慢好起来的,请大家放心。”

备注:汪工,本名汪志刚。四川省北川县擂鼓镇供电所党支部书记。

我的家在云上,在花间。那里的天湛湛蓝蓝,那里的云浩浩瀚瀚,那里的花四季有开。

那年,我考上了武汉一所名牌大学,算是云上花间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。父老乡亲们比过大年还欢喜,抬着大锣大鼓到我家吊脚楼前敲得云开日出,擂得花枝招展。

只记得我离开生我养我的山村去大武汉上学的那一天,乡亲们提着选了又选的大鸡蛋,提着精而又精的腊肉,老老少少聚在我家吊脚楼前,装进父亲送我去武汉的背篓里。

父亲背着那只满载老老少少乡亲希冀的背篓,我么叔牵着马,我坐在马背上,在全村人的期盼中踏上了那条唯一通往山外的羊肠小道。那条小道要经过一段陡峭的叫扯根坡的崖壁,如果不小心就会连人带马摔下谷底,非死即残。因此我那个山村有人一生都没有下过这个坡。我们一路小心翼翼,走了两天才到县城,再搭班车去武汉。么叔把我和我爸送上去武汉的班车,吹着“妹妹要过河”的口哨,欢欢喜喜地往回走了。我爸叮嘱他扯根坡时一定要抓紧路边的藤,么叔笑着说:“我就不信那崖壁能困死人。”

蜀道难,难于上青天。这条蜀道一端在川东,另一端在鄂西。我的家乡便在这条蜀道的另一端。班车在川汉公路那悬崖峭壁上盘旋。吓得我不敢睁眼看窗外的景致。又经过两天的颠簸,班车终于到达武汉,在武昌客运站停了下来。

车水马龙的大武汉与我那寂静的小山村完全不一样,我四顾着那高耸入云的楼、宽阔的路,看着大大小小的车在大路上奔驰,好生惊奇。这个承载着我对未来无限憧憬的大城市,让我心潮激荡。我暗暗对它发誓:我一定好好读书,让我家乡的路变得跟它的路一样好走。

我乘坐大学接站的大巴车进了武大。这时另一辆从武昌火车站接新生入学的大巴车在我身边停了下来,车门一开,从车上飞下一个白净的女孩



## 云上花间

□陈敬黎

子,她张开双臂大有拥抱武大之势,大声吟诵:“武汉鸿渐,珈珈梗丰。”

后来,我和英如愿走在了一起,两人开心地谈学习、谈梦想、谈未来,却唯独不敢谈我的家乡,不敢谈我那在川东、湘西、鄂西交界的武夷山崇山峻岭中、至今交通闭塞的家,我怕到我家去的那段陡峭的崖壁阻断了我的爱情之路。

大四暑假,我们在珞珈山上相互依偎,说着暖心的话。

“我想去你家看看。”她对我一笑说。“好!”我没有犹豫,满口答应了。“去你家的路好走吗?”“都是马路!”我对她一笑,脸上闪过一丝她不易觉察的惶恐,我没有骗她。“那我们就快点准备早点动身。”

“好!”过了两天,她主动给我父母买了礼物,欢欢喜喜地跟我一起从武汉乘车,向鄂西大山里那个她憧憬的家出发了。她靠在我的肩头,随着班车出武汉,穿过江汉平原,爬上武夷山,在川汉公路上七弯八拐到了我们县城,又跟着我一高一脚低一脚往家里走。一路上,为了分散她的劳累之苦,我

给她讲我的母亲河清江,讲我家的蓝天白云、四季花事、清新空气。她一直抿着嘴微笑着听我说。走过扯根坡大悬崖时,她吓得连声尖叫却没有打退堂鼓,终于提心吊胆地到了我家。这一夜,她一觉睡到天亮。

第二日,我么叔和村里的几个青壮年男人得知我回家的消息,相约到我家来坐坐。我扯了一通武汉的楼有多么多么高、路有多么多么平坦之后,他们沉默了,都低头吧咕着自己种的土烟。过了一会,么叔抬头对我说:“我们几个人商量过,打算打通扯根坡,从悬崖上修一条路出去。”

“那个工程量太大,我们得有思想准备。”我没有说“你们得有思想准备”,是因为这条路也关系到我,他们是来找我这个读书人讨说法的,我不能泼冷水。

“愚公都能移山,我们一代人打不通,就两代人,两代人打不通就三代。我就不信这条路通不了,我们世代代就只能困死在这大山里。”么叔坚定地说了。

国家正在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,我把我从大城市得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们,但没有告诉他们湖北不是西部。虽然我们这个地方紧挨重庆,在武

做点什么了!”在仔细商量后,我们在课余走出了校门,开始做社会兼职赚钱,把挣来的每一分钱一起存在一本存折上,并给这本存折取了个名字,叫“壁挂公路专款”。我们很清楚,从白云生处花团锦簇的我,到连接乡级公路的13公里路程,全部在山腰上蜿蜒,特别是要从3公里多的扯根坡悬崖陡壁上开凿公路,这点“专款”如杯水车薪。但我们约定就是饿肚子也不能动用其中一分钱。

几个月后我们毕业了,都分配在省城武汉工作。第一个月拿到工资后,我们连同那笔“专款”一起,全部寄给了么叔,委托他代我们为那个壁挂公路买雷管、炸药,算是专款专用。

一年后的一天,我又收到了我爸的来信。他在信中说,村里那段路已经修好了,公路已经修到扯根坡了,现在进入修路工程最艰苦也是最危险的路段,要在悬崖陡壁上凿出一条“天路”。回信中,我再三叮嘱父老乡亲们注意安全。

接下来的日子,我等待着家里的来信,期待那条“天路”修通的好消息。可是又一年后我收到父亲传来的噩耗:么叔跟几个年轻人一起把麻绳捆在腰上,吊下悬崖,在崖壁上打炮眼,但身上的麻绳缠在锋利的石头上,磨断了,他摔下悬崖死了。我捧着信,手在颤抖,欲哭无泪。我知道他们面临的凶险,却无力相助。

接下来的几年,我在武汉结婚生子,心却一直悬在我家乡的那条天路上。

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、村村通等政策的不断落地,悬在我心上的壁挂公路,历时10年,以倒下八个壮士的代价通车了。

这年春节,我带着妻儿回家。我们坐车一出县城,突然看见通往我家的那条乡级公路变成了宽阔的沥青公路。当汽车拐进壁挂公路时,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条连接那云上花间的盘山玉带,仿佛一把打开崇山峻岭的钥匙,直插云霄。我们惊诧于这条玉带的壮观,惊诧于在那条玉带上蜿蜒行驶的大小车辆。人定胜天!我与妻儿下了车,用脚丈量着这条以八条鲜活生命换来的天路的长度。

我的家在那条血色玉带连通大世界的云上花间。今日,这条以愚公移山精神震惊人世的壁挂公路,吸引了无数山外来客来看这蜿蜒在云上花间的人间奇景,久久不愿离去。



以文学记录乡村振兴